

南方青铜时代考古的重大突破



李伯谦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位于江西省樟树市(原清江县)的吴城遗址,1973年发现,同年开始发掘,至今已有32个年头了。作为1974年秋季吴城遗址第三次发掘的参加者,我是怀着喜悦和激动的心情读完《吴城——1973~2002年考古发掘报告》的。

该报告共分5章17节。第一章概念分为两节分别介绍了吴城遗址所在地区的地理位置、环境、历史沿革和工作概况。从工作概况一节,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吴城遗址发掘和整个吴城文化研究的历史。这一节当然不是全书的重点,但我读起来却勾起了许多难忘的回忆。1974年春季的一天,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的苏秉琦先生通知我们一起去观摩我的老同学李家和千里迢迢从江西扛来的吴城遗址出土的陶片标本,并决定由我和李仰松、贾梅仙两位教师率领1972级考古班部分同学到吴城考古实习。当年9月,当我们到达发掘工地,白天冒着酷暑和江西省博物馆考古队李家和等老师们一起拉探方、揭表土、划地层、掏灰坑、拣陶片、量坐标、包小件,晚上一边和蚊子战斗一边写发掘日记、填发掘记录的情景一幕一幕又浮现在眼前。我仅是1974年秋季吴城遗址第三次发掘的参加者,发掘和整理只有4个半月的时间,而主要的发掘、整理和最后考古报告的编写,则是江西省博物馆考古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历次参加实习的老师与同学们完成的。从我参加的短短几个月的发掘工地生活,完全可以想见他们经历了多少艰辛,付出了多少心血。当年关心吴城遗址发掘和保护的一些领导和专家王冶秋局长、苏秉琦先生、饶惠元先生,和我一起参加发掘的胡义慈、程应林、李玉林等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了;和我们一起在工地奔波的张汉城馆长、马得志先生、刘林先生因身体欠佳也早早脱离自己心爱的考古工作了。我想,这部考古报告的出版应该是对已逝者最好的纪念,是对不能再赴考古工地和年青同志们一起战斗的老战友们最好的慰藉,而对于年富力强正活跃在考古第一线的年青朋友们来说既是丰收的庆贺又是奔向新征程的鼓励。第二章是遗址分区

与地层堆积,作者依据城址内的地理环境特点和工作情况,将城址内分为9区,选择其中7区的11组单位,详细地交代了地层堆积情况。由此可以看出,吴城遗址不同地点文化层堆积情况是有差异的,有厚有薄、有早有晚,有的是各个文化期连续堆积,有的只有个别期段的堆积,其在功能上也不完全一致。第三章城址,重点对城垣、城壕及城门介绍之后,按照功能不同分为居住区、祭祀区、制陶区、冶铸区和墓葬区,报道了各区的发掘情况和作者的分析意见。第四章文化遗物,详尽公布了出土的石器、陶器、原始瓷器、青铜器和各类质料器物上刻划的文字、符号和图像资料。第五章结语,重点探讨了吴城遗址的年代分期和吴城遗址的特征与性质,提出了吴城遗址是商时期“中国长江以南最早跨入文明门槛的地区”的论断。报告随文插图258幅,彩版16幅、图版64幅,真可谓图文并茂,与正文相配,报告尚附有各种统计表、登记表13个,各种检测报告和相关文献7篇,作为各种立论的数据依据和参考。毫不夸张地说,这部考古发掘报告凝聚了所有参加发掘、整理和编写者的心血,吸收了迄今所知所有研究论著的研究成果,比较充分地介绍和阐明了吴城遗址的重要发现及其意义,较好地做到了资料性和学术性的统一,是一部符合要求的考古发掘报告。

吴城遗址是长江以南地区第一个发现的年代明确的青铜文化遗址,其周长达2960米的堆筑城垣,由红土台、建筑基址、广场、柱洞群和长廊式道路组成的祭祀场,残长达7.5米的龙窑,铸造戈、矛、镞、斧、剑、钺等青铜器武器、工具的范,随葬青铜礼器、工具、兵器的墓群及大量成组的硬陶、原始瓷器等均是首次发现,其中有的还是迄今唯一的发现。对这些重要发现,报告作者不是简单罗列,而是在分期和分区研究基础上,一一将其置于特定的时空框架之中,使读者能看到吴城遗址一个完整的、有序的发展图景。

关于吴城遗址的分期,报告从依据地形地貌及工作情况所分的9区中,选择了II区至VIII区7个区中的9组地层叠压关系,结合各层出土器物主要

是陶瓷器的形制、演变特点,先分为早晚连续发展的7个年代组,继而根据其差别的大小合并为早、中、晚三期,从而建立起一个较以前我们所分的三期更为完整、细密的三期七段分期标尺,并通过与其他考古学文化分期的比较研究、参考 ^{14}C 年代测定结果,推断了各期、段的绝对年代。依据这一标尺,我们知道,在范围达4平方公里的吴城遗址上兴建周长约2960米的堆筑城垣和城内中心部位的祭祀场都是在吴城二期;一期早段时尚未发现青铜礼器;长达7.5米的龙窑也出现于二期或以后;硬陶和原始瓷,从一期至三期所占比例越来越多,三期时达到高峰。吴城遗址从形成吴城文化的政治中心到走向衰落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吴城遗址是吴城文化的中心,是吴城文化方国都邑的所在地。而作为一个城邑,是具有明显功能分区的。报告在明确各重要遗迹所属期别年代的前提下,从诸遗迹功能的角度探讨了城内的布局。祭祀区位于IV区,座落于城内中轴线上;陶窑主要发现于I区,与铸铜有关的灰坑等遗迹主要发现于III和IV区,预示手工业生产已有明确的分工;与居住区有关的房址、窖穴、水井、灰坑等在各区均有分布,但从房址规模和结构分析,属一般建筑,高等级贵族的住地似尚未发现;23座墓葬地点相当分散,其中以城址南关外正塘山略微集中,规格也较高,随葬有青铜器的墓都发现于此。综观吴城遗址遗迹的分布状况,显然祭祀区处于城内中心部位,表明宗教祭祀活动是当时吴城文化最高统治者的主要活动和对属下实行统辖的最重要手段之一;烧陶、冶铸等手工业作坊区虽不在中心位置,但也在城内,表明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受到官方的控制,至少铜器的铸造是如此。

原始瓷是吴城遗址发掘出土最有特色的器类之一。原始瓷作为瓷器的前身,当它一经发现便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78年在庐山召开的“江南地区印纹陶问题学术讨论会”上,原始瓷是大家都感兴趣的讨论的热点问题。报告作者在报告附录中用较大的篇幅以龙窑的表现为契机,从窑业技术发展和胎、釉等不同方面,深入探讨了由硬陶到原始瓷的生产过程,对作为瓷器前身的原始瓷的发明及其技术的改进提高作出了有说服力的论证。

吴城文化的性质,从吴城遗址发掘开始就存在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吴城文化是受到商文化影响包含有一定商文化因素而以土著因素为主的一支地方性土著文化,另一种意见认为它虽有一些当地特征但仍然属于商文化范畴,是商文化的一个地方

类型。报告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在将吴城文化的构成因素分为六组的基础上,结合其文化分期推定吴城文化一期早段仅有甲、乙、丙、丁四组因素,其中甲组是由中原地区商文化传播来的因素,乙组是来自中原商文化一支的人群来到吴城地区后,综合多种器物特征,因地制宜而独创出来的具有自身特点的“因素,以大口缸为主的丙组是来自商文化盘龙城类型的因素,丁组是赣西地区真正的土著文化因素”。在四组因素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甲、乙、丙三种因素,而这三种因素均与中原地区的商文化有密切关系,因而吴城一期早段文化“应是来源于中原商文化的一支。只是这一人群来到吴城地区后,其文化内涵自身与其母体产生了一定的变异,并对其母体文化进行了一定的创新”,通过以后的逐步发展,并吸收周邻地区的文化因素(戊、己组因素)从而构成了吴城文化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和面貌。这显然是比上述非此即彼的看法更接近于实际情况的一种认识。

在年代上和吴城遗址相当的遗址近年来在江西省境内有许多发现,报告通过分析,认为江西商时期文化可分为赣南、赣西、赣东北、赣北四个相对独立区域,赣北以石灰山遗址为代表,赣西以吴城遗址为代表,赣南以竹园下遗址为代表,赣东北以万年遗址为代表。每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在文化面貌上既有区别又有相似之处,但唯有吴城遗址包含了殷商时期赣境内诸多文化因素,其间的文化共性是主要的,因而倾向于把整个赣鄱流域商时期文化命名为吴城文化”。其结论虽与我在《试论吴城文化》一文中的观点相同,但分析得更为深入细致,依据的材料也更为充实。

报告取得的研究成果有目共睹,但它毕竟只是1973~2002年吴城遗址发掘收获的总结,随着今后工作的继续开展,吴城遗址还会有新的发现,属于吴城文化的其他遗址也会有新的发现,因此建立在吴城遗址1973~2002年发掘资料研究基础上做出的某些论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新材料的挑战。即使没有新材料发现,认识问题的角度如果改变了,分析问题的方法改变了,也不排除对原来自己所做的结论在重新审视之后会有所修正,甚至改变,别人也会提出新的看法。因此《吴城——1973~2002年考古发掘报告》的出版,虽然是吴城文化研究的重大突破,但仍宜看作是阶段性成果。新的收获、新的成果仍期待着大家通过自己扎扎实实的工作去争取、去获得。我预祝新的重大突破早一天到来。